

鄂西北民歌的研究现状及可拓展空间

向清全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湖北武汉

【摘要】本文以鄂西北民歌研究文献为搜集与评述对象，首先借助民歌相关的“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等），对鄂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方言地理、民歌类别及其分布情况进行梳理与概括，初步明确主题词或关键词；其次，通过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学术数据库中筛选的文献，对相关研究进行分类评述；最终在此基础上，总结鄂西北民歌的研究现状及可拓展空间，以期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鄂西北民歌；歌种；交融性；区域音乐文化

【基金项目】武汉音乐学院 2024 年校级科研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2024xjkt23）

【收稿日期】2025 年 6 月 3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7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58

Research status and potential expansion of folk songs in northwestern Hubei

Qingquan Xiang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Wuhan, Hube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llecting and reviewing research literature on folk songs in northwestern Hubei. First, by referencing relevant "reference book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Atlas", and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Folk Songs: Hubei Volume"),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dialect geography, and the categories and distribution of folk songs in the region, preliminarily identifying key themes or keywords. Next,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from academic databases, filtered by these themes or keywords, is categorized and reviewed. Finall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potential expansion areas for the study of folk songs in northwestern Hubei,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gional music culture research.

【Keywords】 Folk songs in northwestern Hubei; Song genres; Cultural integration; Regional music culture

王小盾教授在《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一书第五讲“利用工具书收集专题资料”的结语部分，系统阐述了历史事物史料搜集的具体步骤：“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物（包括器物、制度、词语、社会角色、学术史问题等），利用工具书，分类列举同它有关的史料。第一步，借助资料索引来搜索有关研究成果；第二步，借助辞书来了解专题的语言学源流；第三步，借助类书来搜集主要资料，建立知识线索、确定主题词；第四步，借助其他工具书（引得书、光盘）来补充材料；第五步，借助目录学著作来选择古籍并加以阅读，进而用各种原始材料来完善自己的资料库藏。”^[1]该方法论虽针对历史事物的史料搜集，但对于其他专题文献搜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特别是“借助类书建立知识线索”这一

环节，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开展实地调查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如知识系统建立与文献索引利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此，本文首先借助民歌相关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等，对鄂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方言地理、民歌类别及其分布情况进行简要梳理，旨在建立相关知识系统并确定主题词或关键词；其次，通过已确定的主题词或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以中国知网、超星、读秀等为主），并对所搜集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与评述；最终对鄂西北民歌的研究现状及可拓展空间进行总结与探讨。

1 文献综述对象的范围及其概况：《集成》《志书》中的鄂西北及其民歌

作者简介：向清全，艺术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长江文化研究院首批“雏鹰学者”。

本文聚焦于鄂西北民歌研究文献的搜集,而现今鄂西北地区常常是指湖北十堰市、襄阳市(原襄樊市)为主体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本文特别选定以十堰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作为研究重点,原因有三:第一,以十堰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紧邻陕南、河南、重庆,深受巴、秦、楚文化熏陶,区域文化呈现出多元杂糅的交融性;相比之下,襄阳则因与河南接壤,更多受到豫文化的影响;第二,“与高层政区相比较,统县政区内部文化现象具有更强的一致性,相似程度更高。”^[2]以十堰市和襄阳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自唐代起便属同一高层政区。从政区设置来看,鄂西北地区自隋代以来便由房州和襄州两大统县政区管辖,其范围与今十堰市、襄阳市管辖范围大体一致;第三,文化地理学界已将十堰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认定为“房陵文化圈”。“房陵文化的构成主要有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流放文化等四种文化成分,这四种文化成分是全国其他地域文化里没有或者少有的……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流放文化等四种主要文化所辐射或覆盖的地域形成房陵文化圈……房陵文化圈的区域相当于或稍大于现在的十堰市行政区划。”^[3]因此,本文将以十堰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视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对该区域民歌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

1.1 鄂西北的历史地理背景

以十堰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还包括丹江口市、神农架林区)。西北部与陕西省南部接壤,东北部以丹江与河南分界,西南部隔长江与重庆市相望,南部则和宜昌地区接壤,自古有“四省通衢”之称。鄂西北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东段,汉江流经此地,属汉江流域的中上游。

(1) 古代政区设置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4]可见,秦汉时期,现今以十堰、襄阳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分属于汉中郡、南郡、南阳郡;隋代,鄂西北地区分属于房陵郡和襄阳郡,房陵郡属巴汉诸郡,襄阳郡属江汉沅诸郡。唐代,行政区划为“道、州、县”三级制,鄂西北地区的房州和襄州属于山南东道;宋代,行政区划为“路、州、县”三级制,鄂西北的房州和襄州属于京西南路;元代,行政区划实行“行省、路、府(或州)、县”四级制,鄂西北地区属河南江北行省;明代行政划分上,“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鄂西北属湖广行省,并下设鄖阳府、襄阳府。清代,湖广行省更为细化,鄂西北属湖北省,并延续明代下设鄖阳府、襄阳府。从以上梳理可知,以十堰市和襄阳市

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自唐代以后属同一高层政区,只是名称有所改变。从政区设置上看,鄂西北地区自隋代开始分为房州和襄州两部分,这两块区域与现今的十堰市、襄阳市所管辖的范围大致相符。

(2) 明清移民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创造的文化千差万别,人口的迁移实质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特质在空间的流动,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文化的传播。”^[5]明代以后,因政治、经济原因向鄂西北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影响着该区域人口的历史构成。如《寻根,我们从哪里来--洪武大移民中的江西填湖北》一文中提到:“从江西填湖广(北)是明初洪武大移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北)基本奠定了湖北人口的历史构成,江西移民对湖北的历史贡献是不可替代的。”^[6]此外,明代因修缮道教圣地也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鄂西北地区。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调集各地军民和工匠大修武当山,涉及人口20余万人,这些人口主要来自四川、陕西、河南、浙江等地。这次大修,费时十余年之久。在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又下旨重修武当山,此次修缮工作近历时1年,学者分析此次修缮工作又从各地抽调10万人口^[7]。清代也是外来人口迁居鄂西北的重要时期。据同治版《鄖阳府志》记载:旧志谓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河南(河)北之民一,土著二;今则四川、江南、陕西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踵至,聚族于斯。语言称谓,仍操土音,气尚又各以其俗为俗焉。

可见,明清的移民基本奠定了鄂西北地区人口的历史构成。以移民为载体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该区域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鄂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3) 方言的地域性特征

人口迁移、地缘关系对该区域的方言也有所影响,据《中国语言地图集》^[8]中“官话之六西南地区”的划分,鄂西北大部分地区属于西南官话鄂北片,但竹山、竹溪县等地存在语言孤岛现象,其方言归属江淮官话。这种语言孤岛现象通常被认为是,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等因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所致。除竹山、竹溪县语言孤岛现象外,其余地区虽同属于西南官话鄂北片,但方言形态仍呈现多样性。“汉江上游鄂北片存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三种官话方言,且三种官话方言之间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形成了汉江上游鄂北片方言的混合性特征。”^[9]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可知，因政区设置、地缘关系、移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巴蜀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甚至吴越文化在鄂西北地区长期碰撞交融，塑造了该区域多元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交融在方言中表现尤为突出，而方言对民歌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1.2 鄂西北民歌

以十堰市为主体的鄂西北地区由于长期处于政治中心边缘地带，又因其地貌类型以高大山体和低山丘陵为主，形成天然屏障，使得该区域民歌储存丰富。且鄂西北地区与陕西省、河南省、重庆市的部分地区相连，使得该区域的民歌种类以及风格特征与周边地区存在一定的共性。以笔者曾走访的鄂西北房县和竹溪县为例，

两地民歌种类十分丰富，薅草锣鼓、待尸歌等都是当地独具特色的歌种，而这两类歌种也广泛流传于陕南、川东地区；小调的流传更为广泛，鄂西北地区与陕南、川东地区存在一些词曲相同、词同曲异、曲同词异的民间小调。如《倒采茶》是鄂西北地区较为有名的民间小调，为时序体，歌词中以讲述古人故事为主，笔者在陕南镇巴县也同样采录到词曲相同的《倒采茶》。就音乐风格特征而言，鄂西北民歌常呈现出交融性，在诸多的文献中将这种交融性概括为“楚调、巴音、秦韵”^[10]。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11]对鄂西北地区民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并在前言中对鄂西北民歌进行了概述。笔者将《集成》中记录的鄂西北民歌种类进行了简要的归类梳理^[12]如下：

表 1 鄂西北歌种及流行地域梳理

体裁	种类名称	流行地域
山歌	山歌	鄂西北各地
	孝歌、打待尸、夜锣鼓、阴歌、阴锣鼓 ^[13]	鄂西北大部分地区
	阳锣鼓、薅草锣鼓、山锣鼓	竹溪、房县、神农架林区
	打杵号子	竹溪
	踩秧号子	房县
	赶仗歌	房县
	船工号子、船夫号子	郧西、郧县、竹山
劳动号子	打夯号子	丹江口市
	搬运号子	郧西
小调	小调	鄂西北各地
	花鼓子	竹山、竹溪、丹江口市
	哭嫁歌	郧西
	陪十姊妹、陪十兄弟	神农架林区

通过上表对《集成》的梳理可见，鄂西北地区民歌品类繁多，山歌、号子、小调三种体裁均有所涉及。山歌体裁中以薅草锣鼓独具特色，薅草锣鼓为劳动人民在田间劳动时，为鼓舞干劲、协调劳作，以歌师领唱、众人唱和，并带有锣鼓伴奏的形式。其演唱内容丰富，以历史故事为主，但也有歌师自编的内容。它在鄂西北不同地区称谓不同，如在房县被称为山锣鼓，在竹溪县被称为阳锣鼓，在神农架林区被称为薅草锣鼓等。孝歌、打待尸、夜锣鼓、阴歌、阴锣鼓则是鄂西北不同地区丧葬仪式上歌师演唱并带有锣鼓伴奏的民歌形式的不同称谓。演唱内容以长篇故事为主，但也涉及一些奉承孝家、劝人向善以及歌师自编的内容。笔者在此将它归类

为山歌体裁，主要是从音乐形态特征上考虑，这类歌曲大体属于山歌体裁，但也有小调体裁的加入。号子体裁中又以船工号子、船夫号子、打夯号子、搬运号子为主，这与劳动内容和场合密切相关。由于小调具有易于流传性，所以在鄂西北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小调体裁中存在的一些风俗性小调，如神农架林区的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等，实则为哭嫁歌中的演唱内容。“花鼓子”则为人们在玩灯时，手持道具各自边唱边舞的民间艺术形式。从《集成》收录的花鼓子演唱内容可见，它主要是指边唱边舞中唱的部分，而该区域又常将这种纯歌唱的部分称为“火炮歌”^[14]。

尽管《集成》可能因收集者地域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限制,存在部分类别未被涵盖的情况,但大体仍呈现了部分民歌体裁及歌种的分布情况和形态样式。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鄂西北地区地貌类型以高大山体 and 低山丘陵为主,山歌较为盛行,分布成密集型;歌种薅草锣鼓,在地势较高的大巴山旁的竹溪县、神农架林区及周边的房县保存较为完好;号子体裁中的船工号子、船夫号子则分布在,处于汉江上游的郧西、汉江上游及支流堵河上游的郧县和堵河下游的竹山县等部分地区。

以上是笔者借助民歌相关“工具书”,对鄂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方言地理、民歌类别及其分布情况的梳理和概括,在大致了解鄂西北民歌相关情况的同时,认为该区域的民歌研究文献可通过“某地区+民歌”“某歌种”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学术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下文将就搜集的研究文献展开系统性整理与分析。

2 鄂西北民歌研究文献述评

通过主题词或关键词所搜集的研究文献可知,前人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方面:第一,以鄂西北地区中的某块区域为研究范围;第二,以鄂西北地区中的民歌体裁、歌种或是音乐文化现象为研究线索。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方面的研究,不但有音乐学界,同时也有其他学界的参与。

以鄂西北地区中的某块区域为研究范围的文献,涉及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村、丹江口市及均县镇、十堰市门古镇及房县、神农架林区、竹溪县向坝乡、郧西县、郧阳县等地。

吕家河村现作为汉族民歌第一村,较早就受到了音乐界的关注。而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蒲亨强教授的《民歌村六奇——湖北武当民歌村考察纪实》^[15],从歌手、歌曲数量、曲目腔调、风格特征等方面对吕家河民歌进行了论述;李月红教授《“武当民歌村”吕家河民歌考辨》^[16]一文,对当地小调的唱词内容、结构以及音乐形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分析,并对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偶然因素进行了探讨;臧艺兵教授的专著《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17]及相关论文,主要以吕家河村民歌手姚启华及相关联群体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人生史的描述与阐释,探讨歌师与社会、历史、民间音乐互为构建的过程。

与吕家河村同属丹江口市的均县镇,则关注度相对较低。最早的研究文献见蒲亨强教授的《武当道乐与均县民歌》^[18],该文主要从音乐形态和历史背景等方面入手,从而论证“均县部分民歌是因武当道乐之影响而形成其特异风采”。而康平的《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调查》^[19],则主要对丧葬仪式及其音乐进行了

民族志式的记录。

十堰市的房县及神农架林区民歌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期刊论文中对该区域民歌的专题探讨主要来自音乐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而在音乐学界的代表性文献中,既有音乐形态的研究,如周青青教授的《从房陵民歌看民歌旋律的“底层”“借用”与“交融”》^[20]、向清全的《湖北房县民歌的体裁归属研究》

《鄂西北房县民歌音乐形态的“融合、兼融”现象分析》^[21]等;也有关于民间唱本的专论,如孙晓辉教授的《鄂西民间手抄唱本音声符号“■”考释》^[22]、杨帆的硕士学位论文《神农架长篇唱书<黑暗传>的文本与仪式音乐研究》^[23]等;同时,歌师及关联群体的考察研究也备受关注,如李月红教授的《湖北房县民歌寻访》^[24]、王梦熠的硕士学位论文《神农架玉林班音乐研究》^[25]。非音乐学界的研究文献则主要有如下两篇,一篇为房县“诗经民歌”的考辨,《现代民歌中蕴涵的古代文化——对湖北房县民歌与古代典籍之间关系的考察》^[26],一篇为门古寺镇民歌生活的考察,《作为生活方式的民歌演唱——对于门古寺镇民歌生活的考察》^[27]。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界刘守华教授关于该区域乃至整个鄂西北地区民间唱本《黑暗传》的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文献。

较之以上地区,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郧西县、郧阳县等地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于竹溪县向坝民歌的研究,《鄂西北向坝民歌的艺术特征及演唱研究》主要集中于向坝民歌演唱的探讨,《向坝民歌的起源·发展研究》则侧重于向坝民歌的类别介绍以及发展的看法等;而郧西民歌的研究,多围绕文化内涵展开,如《郧西民歌的道德观探微》等;郧阳民歌的研究则偏重于概述,主要有《湖北郧阳民歌音乐特征研究》《郧阳丧歌的文化意涵》等。

需要指出的是,针对鄂西北地区某块区域的民歌研究及介绍,其相关内容不仅集中在期刊研究文献中,该区域各县市的《志书》和《歌集》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文献。如《十堰市志》^[28]对鄂西北地区的主要歌种进行了介绍,并列举了各县的民歌概况以及歌集的编撰情况。《房县志》^[29]介绍了在房县流传的民歌,主要包括薅草锣鼓、山歌、灯歌、婚俗歌、小调、丧鼓、儿歌,并将《集成》中划分为田歌的薅草锣鼓、划分为风俗歌的婚俗歌和丧鼓,单列出来介绍。《郧西县志》^[30]虽未对郧西县民歌作具体介绍,但该《志书》记录了当地歌曲集《郧西民间歌谣》《郧西民歌集》的收录、编撰情况。而康熙年间和嘉庆年间的《湖广郧阳府志》《郧

阳志》中的“艺文”篇，主要以记录明清时期的文人诗歌为主。除《志书》外，各县市政府文化部门联合地方学者、歌师出版的歌曲集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如《房县民间歌曲集》^[31]中按照体裁将房县民歌分为山歌、田歌、风俗歌、灯歌、小调、新民歌六大类，且每一类别都配有相应曲谱资料；《房县民歌集》^[32]则将房县民歌分为：情歌、劳动歌、生活歌、风俗歌、传说歌、戒喻歌、散歌八类。该歌集主要是按照题材内容和演唱场合对民歌进行分类，且只记录了歌词。

以鄂西北地区的民歌体裁、歌种或是音乐文化现象为研究线索的文献，则主要聚焦于薅草锣鼓和丧鼓歌（待尸歌）两个类别。关于丧鼓歌（待尸歌）的研究，李月红教授在其专著《汉族民间长篇叙事歌的音乐类型及文化属性》^[33]中，基于神农架林区、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和房县部分村落的考察，探讨了丧鼓歌的局内和局外称谓，完整记录其仪式流程，并从唱词内容与形式、音乐形态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凌崎博士的《郧西县“打带诗”仪式调查研究》^[34]同样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对其仪式结构、唱词、唱腔及锣鼓牌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阐释。此外，还有《民歌与民俗——鄂西北丧鼓初探》《武当丧俗音乐“待尸歌”初探》等。可见，鄂西北地区丧鼓歌（待尸歌）的研究已在仪式过程、唱词内容、音乐形态等方面有了一定积累。而关于薅草锣鼓的研究，既有对该歌种音乐结构的分析梳理，如《鄂西北薅草歌的结构形式》^[35]，也有对该歌种与传统农业时代生产方式关系的探讨，如《从薅草锣鼓中追寻传统农业时代的节奏——以川、楚、陕等交边地区为中心》^[36]等。

3 鄂西北民歌研究现状分析及可拓展空间

通过以上两方面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对鄂西北民歌的研究形成以下初步认识及思考：

第一，现阶段鄂西北民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或是特定歌种。通过上述梳理与代表性文献选介可见，以鄂西北地区的某块区域为范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村，十堰市房县、神农架林区等；以鄂西北地区中的民歌体裁、歌种或音乐文化现象为线索的研究成果，则以薅草锣鼓和丧鼓歌（丧葬仪式中的歌曲）为主。此外，房县的“诗经民歌”及鄂西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唱本《黑暗传》，亦受到多学科关注。现有研究涉及到该区域民歌的分类、音乐形态、唱词内容、演唱方式与方法、相关的历史与文化、传唱者（歌师、歌班）及传承发展等内容。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对鄂西北歌种及分布的梳理可知，该区域中部分地方及歌种仍有巨大研究空间，部分歌种（如消亡速

度较快的薅草锣鼓）的研究深度仍需加强。同时，将鄂西北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对其民歌种类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并探究其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目前仍较为鲜见。

第二，通过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等“工具书”及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可知，因政区设置、地缘关系、移民等多方面因素，鄂西北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并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地方志》《民间歌曲集》等文献对鄂西北民歌进行了收集、整理与概述，同时展示了曲谱，这为该区域民歌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故而，在区域音乐文化视野下，开展“多点”式田野考察，对该区域民歌种类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是当前必要且可行的课题。

关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乔建中先生在《构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与教学体系的初步设想》中以反问形式清晰阐述其内涵：“‘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是以特定地理环境中人的音乐活动形态为主要内容，分别考察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人们如何选择了区域内的音乐体裁、品种？有哪些优秀的表演形式、曲目及演唱风格能作为‘音乐文化区’的代表？人们的音乐行为与区域民俗传统、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方言音调有哪些内在的联系？不同区域音乐文化板块间有什么联系和差异？‘区域音乐文化’的形成在哪些方面受到古代文化的影响？某个特定‘区域音乐文化’具有哪些人文品格等等。”^[37]

可见，在区域音乐文化视野下对民歌进行研究，既要对该区域民歌的种类、分布等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风格特征进行分析、归纳、总结，还需将民歌置于该区域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地理背景中加以审视和考量，考察民歌在发生和发展中受到的自然、历史、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民歌中的体现方式和形态。此类研究使得自然、历史、人文地理环境不再仅作为民歌的生存背景而孤立存在，也避免了对民歌的研究只停留在“横向”层面，从而忽略了对民歌发生、发展过程的“纵向”追溯。可以说，将民歌置于自然、历史、人文地理背景中，探讨相互间的互动关系，使得民歌研究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时空性。

乔建中先生在“第四届全国高校区域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关于汉水流域音乐研究的初步构想，即“统合以往资源、重启田野考察、强化历史观照”^[38]，虽该想法是就汉水流域音乐研究提出，但为区域音乐研究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思路。因此，在区域音乐文

化视野下对鄂西北民歌进行研究可以遵循以下步骤:

第一,通过文献考据,对鄂西北地区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进行梳理、概括与总结。第二,通过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研究,对鄂西北地区民歌种类及其地理分布进行全面梳理。第三,对实地调查中所收集、记录的鄂西北民歌的“活态”样本进行音乐形态分析,总结归纳鄂西北地区民歌每一类别的风格特征及总体风格特征;第四,将该区域的民歌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的分布状态、自然、人文、历史地理背景联系起来,宏观把握并高度总结民歌的区域性特征。值得关注的是,前文已提到鄂西北地区处于湖北省的边缘地带与陕南、川东等地区毗邻,而“边缘地区一般具有双重作用:有的情况下,风格在这里严格的保存下来,而另一种情况下,它们相互混合失去原来的面貌。”^[39]因此,在鄂西北民歌的研究中,我们还应在思维观念上打破政区边界的局限,进行跨区域的实地调查,注重该区域民歌及其文化与川东、陕南地区的“横向”比较研究,从而呈现该区域民歌及其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共性以及自身的独特个性,并进一步思考:政区划分对民歌及其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政区边界与音乐文化边界的关系?政区划分对于音乐文化整合、分异方面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小盾.中国音乐文献初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7.
- [2]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368.
- [3] 傅广典.论房陵文化的构成、价值及其圈层[J].民间文化论坛.2005(1):37.
- [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精装本)[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 [5]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
- [6] 周启志.寻根,我们从哪里来--洪武大移民中的江西填湖北[J].学习与实践,2010(05):133.
- [7] 参见蒋显福、匡裕从、杨立志主编.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274.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M].香港.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1990.
- [9] 柯西钢.汉江上游鄂北片方言的地理格局及混合性特征[J].方言,2010(01):80.
- [10] 在期刊文献、个人专著、房县政府及文化部门出版的文献资料中均用“楚调、巴音、秦韵”概括房县民歌的特点,但“楚调、巴音、秦韵”的具体提出者还待进一步考证。
- [11]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 [12] 笔者的归类标准主要按照民歌体裁三分法,关于民歌体裁三分法主要参见:周青青.汉族民歌体裁分类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03).
- [13] 笔者将“孝歌、打待尸、夜锣鼓、阴歌、阴锣鼓”大致归类于山歌当中,主要参考《汉族民间长篇叙事歌的音乐类型及文化属性》(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1),该书对鄂西北部分地区丧鼓歌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丧鼓调为小调化单曲体山歌。
- [14] “火炮歌”因火炮伴奏而得名,而“火炮”为民间对锣、鼓、马锣、鐃等乐器组合的统称,有时也将这些乐器组合称之为“家业”,它常在结婚、祝寿等喜庆场合中演唱。
- [15] 蒲亨强.民歌村六奇——湖北武当民歌村考察纪实[J].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2).
- [16] 李月红.“武当民歌村”吕家河民歌考辨[J].中国音乐,2003(04).
- [17] 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M].北京.商务印刷馆,2009.
- [18] 蒲亨强.武当道乐与均县民歌[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8(04).
- [19] 康平.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调查[J].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1).
- [20] 周青青.从房陵民歌看民歌旋律的“底层”、“借用”与“交融”[J].中国音乐,2011(01).
- [21] 向清全.湖北房县民歌的体裁归属研究——兼对民歌民间分类与学术分类的思考[J].中国音乐,2019(04);鄂西北房县民歌音乐形态的“融合、兼融”现象分析[J].中国音乐,2020(04).
- [22] 孙晓辉.鄂西民间手抄唱本音声符号“■”考释[J].音乐研究,2018(05).
- [23] 杨帆.神农架长篇唱书<黑暗传>的文本与仪式音乐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

- [24] 李月红、余一玲.湖北房县民歌寻访[J].中国音乐, 2008(01).
- [25] 王梦熠.神农架玉林班音乐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 [26] 陈连山.现代民歌中蕴涵的古代文化——对湖北房县民歌与古代典籍之间关系的考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0(01).
- [27] 瞿昊.作为生活方式的民歌演唱——对于门古寺镇民歌生活的考察[D].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 [28] 十堰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十堰市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2163-2168.
- [29] 湖北省房县志编撰委员会.房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547-557.
- [30] 郧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郧西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654-655.
- [31] 王启云、肖鸿主编.房县民间歌曲集[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7.
- [32] 杜明亮,张歌莺主编.房县民歌集[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7.
- [33] 李月红.汉族民间长篇叙事歌的音乐类型及文化属性[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
- [34] 凌崎、葛婷.郧西县“打带诗”仪式调查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1(01).
- [35] 胡曼.鄂西北薅草歌的结构形式[J].中国音乐,1983(01).
- [36] 张建民.从薅草锣鼓中追寻传统农业时代的节奏——以川、楚、陕等交边地区为中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02).
- [37] 乔建中.构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与教学体系的初步设想[J].“首届全国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3.
- [38] 参见向清全.“第四届全国高校区域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J].人民音乐,2016(10):45.
- [39] [匈]萨波奇·本采.旋律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304.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